

民族诗歌：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

□谭旭东

民族诗歌，一般指称某一特定民族的诗人写作的诗歌。但民族诗歌之所以被指认为民族诗歌，也是因为其诗歌的民族身份，即创作者的民族身份可能决定其诗歌内在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表达。在当代中国，民族诗歌似乎意义更为确定，它主要是指称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诗人的诗歌。比如，彝族诗人、蒙古族诗人或回族诗人写作的诗歌，都属于民族诗歌，特别是他们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诗歌。因为在中国，由于民族政策的关系，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似乎才被习惯性地称为“民族”，所以各省市社科院设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通常都是以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而《民族文学》这样的文学刊物也主要是刊登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而《民族文学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其发表的论文，也通常是以5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

但民族诗人的诗歌写作，是否因为其民族身份，就可以确认为民族诗歌呢？我以为民族化的表达或民族性的书写，并不是很容易清晰呈现的，因为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是内在的、隐性的、深藏的或潜意识的精神因子，单纯从诗歌语言层面很难直接判断出来。因此，以诗人的民族身份来指称民族诗歌，确实有一定的便利性，但不一定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民族诗歌的内在精神品质。如果要准确地给民族诗歌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民族诗人书写的以反映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诗歌，才可能称为民族诗歌。就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诗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汉族诗人为主体的汉族诗歌写作；二是由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的诗人以本民族语言或双语写作的体现特定民族文化特征的诗歌作品。

但作家民族身份也有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境下，一个民族已经很难完整地保持其固有的民族性。在全球化趋势并不明显的时代，一个民族通常能够较长时间地保留自己的民族习俗、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今天的全球化情境下，各民族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都在变动、交错与融合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保留其原本的最初的方式，除非与世隔绝，除非他至今还处在原始部落时代，否则就不可能和其他民族交融汇合。世界文明的进程，不仅仅是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媒介文化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民族之间界线的模糊和民族文化的汇流，其中也包括民族的迁移、人种的杂交而带来的民族血统的交融。甚至在古代，强势民族对弱小民族实行的战争吞并，从客观上也起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作用，只不过这是一种非人道的野蛮的文化侵略罢了。

从这一点来看，那种以血统来区分民族性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近亲繁殖也是不利于物种和人种进步

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状态，就是因为物种的不断杂交和变化，就是因为一些物种在消失而另一些物种在诞生。朝鲜族诗人南永前先生一直致力于图腾文化的研究和图腾诗的写作，他认为“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始积淀层，那里有民族文化之元，那里有民族灵魂之源，那里有人性之本真”。在研究朝鲜族的图腾文化时，他惊喜地发现朝鲜民族的图腾物与中华民族的图腾物有着不可分割的亲近的血缘关系。他有一个观点非常好，他认为“民族是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血统的概念。民族是以文化区分的，而不是以血统区分的，论血统各民族都是兄弟。”南永前还考证了朝鲜族中“南姓”一支的始祖南敏就是唐朝凤阳府汝南人。今天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也证明了南永前的观点是正确的。人类的发史更告诉我们，各民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民族可以保留其文化的基本基因，同时也会与时俱进地不断刷新自己的文化，并和其他民族交流而创新自己的文化。从而使本民族文化更加焕发生机活力，更加富有张力，更能展示本民族的智慧。

在这方面，我以为为民族文学，尤其是民族诗歌可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纵观历史，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诗歌也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最强音。往往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诗歌唤醒了民族意识，激发起民族抗争的意识，引导着觉醒的人民。2007年10月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我和蒙古族诗人查干先生访问波兰，参加华沙国际诗歌节。在华沙我们拜谒了波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的灵柩。密茨凯维支书写波兰民族精神的诗歌曾在波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发挥了巨大的号召作用，所以波兰人民敬重这位诗人，并把他的石棺灵柩与波兰历代国王、历史名人、民族英雄的石棺灵柩安葬在一起的。学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在欧洲，波兰民族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18世纪后半期她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独立，1918年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1939年又被德国占领。到1944年才建立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的作家朋友对我们说，是密茨凯维支、米沃什等这样的优秀诗人，为苦难的波兰民族保留了气节和操守，是密茨凯维支、米沃什等创作的充满民族情怀的诗篇守护和温暖了饱受外辱侵略和折磨的苦难的民族心灵。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也知道中华民族饱受磨难的时候，也是文学和诗歌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唤清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与其说是诗歌语言形式的变革，不如说是近代知识分子以诗歌来启蒙民众，唤醒民族的变革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强烈的声音就是诗歌的声音，郭沫若的诗歌《女神》激发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新生愿望。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爱国诗歌激发了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争的精神。

死捆住。彝族山里妹的红腰带，不是一般的腰带，而是裤带。整根带子用红布缝制，两端用其它颜色的丝线绣着极其美丽的图案。这种腰带对彝家女人来说特别神秘，男人是从从来看不到女人的红腰带的，这就有了看见妹儿红腰带的男人注定要成为那妹儿丈夫的传说。因此，如果不是十分紧急、万不得已，林梅和她的姐妹们是不会解下她们的红腰带的。解下红腰带后，必须立即把裤子的腰口一卷，折一节小木棍别住，再一卷，裤子才不会松脱。七个姐妹在犯人面前解腰带、系裤子的紧张场面可想而知。

20岁的彝族姑娘解下红腰带、抓住在逃犯的最新事迹很快传到县里、省里，她成为村里党支部的人

党培养对象，她的事迹以《山里妹的红腰带》为题见了报，她还被推为民兵的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正当她从北京回来，向父老乡亲们传达自己一路的见闻和感受的时候，却收到了寄自太平农场的被她逮住的那个“逃犯”戴平昌的求爱信。原来县城中学的俄语教师戴平昌被送去劳改是一个冤案。那天他被林梅紧紧抱住，对这个勇敢而美丽的彝族姑娘产生了好感。于是“民兵英雄”和“劳改犯”一起堕入爱河。尽管林梅的父亲坚决反对，但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后，一对热恋的情人终于结为夫妇。不幸林梅在抗震救灾中英勇牺牲，戴平昌也受了伤。他决心终身不娶，分别用英语和俄语创作了歌曲《妹儿的红腰带》在国外发表并在国内外传唱，歌曲深情地唱着两人纯洁真挚、如泣如诉的爱情。

小说语言朴素流畅、生动活泼，故事情节离奇曲折而又真实真实，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和边疆民族色彩。70多岁的彝族老作家普飞用他数十年的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和思想感情的积累，通过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聪明、漂亮、纯洁、善良而又勇敢、倔强、可爱、可敬的彝族女儿的形象。

蒙古族作家阿古拉泰的《新时期近作选》(作家出版社出版)五本书,如同草原上微拂的五色清风,带来故乡蓝天白云和水草的信息,给幽闭的心灵敞开一条通往那片“从来也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生我之地的曲径，随着漂泊的文字,再一次踏上归乡之旅。

阿古拉泰集豪放与婉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实际上书写的已经不再是单纯代表了海浪、远山、骏马、煤矿和在他生命的水面上激荡起阵阵波纹的人们表层概念的东西，他的文字像一根根银针，缓慢而悠长地侵入到读者的灵魂，让人在微微地疼痛和新进的甜蜜中品味出那些日常惯见的名词中所深蕴的不朽的生气和力量。

诗人的语言时而雷霆霹雳、歌舞战斗，时而忧伤愉快、怨恨思慕，创造着如同往返于斯科帕斯和拉斐尔给世界带来的“崇高”与“秀美”的艺术冲击里一般的诗歌的奇迹。“蒙古人的季节/永远追随着蓝天白云走/当绿遍布了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故乡在我们心中就成为/灵魂的高地……”(《众鸟高飞》)“像一棵草一样行走/在草原/在戈壁/在城市水泥的缝隙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用自己的瘦/用自己的小/用深绿色的骨头/……像一棵草一样行走/不能在泥土中扎根/就在石头缝里跋涉/像一棵草一样行走/无所畏惧/毁灭/就成为了时光的样子”(《像一棵草一样行走》)一般来说，在希腊的艺术中，崇高和雄伟的风格的表现原则是不体现感觉，而且是柏拉图所说的最困难不过的表现形式。但诗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把所有能表现的力度都揉成一种看似无表现力的平淡，时刻让各种能体现出有意蕴的灵感的因素转化为逻辑的沉默，从而衬托出所歌之物极至的自然之美。“秀美”的概念往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而流于矫揉造作，但阿古拉泰小心地，或者应该说是以一种诗人天生的创作敏感不留痕迹地绕过了这一危险地带，他笔下的“秀美”没有矜持，没有束缚，每一个字都跃动着欢快可人的音符。

对诗人来说，诗歌和散文的美包括了表现力的许多方面和多种类型。有人曾经向诗人发问，为什么不见他专意书写爱情的诗篇？其实，诗人对待爱情的方式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诗性传统，他并没有将艺术对象的范围缩小为单一而抽象的类型，而是倾向于使用多种意象作为寄情方式。爱情是一种情绪，一种爱的情绪，诗人把这种爱的情绪扩大和融入到他眼中所见的一切美好事物，我们从他高亢地歌颂声和惊叹地赞美声中不难想象出诗人心底流淌着的爱情洪波，不难找到深藏在诗歌和散文背后的体现诗人完整而诚实的爱的宣言。“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鹰的翅膀/展开一泻千里的草原、奶酒和琴声/展开浩渺的时光、梦想与永恒的爱/……当内心的激情辽阔成一片蔚蓝/苍穹啊/就坦然奔腾成了/逶迤蜿蜒的河流/……”(《鹰的翅膀》)“一只大雁飞走了/在初春/露水成霜的大地/怎么也含不住一声/忧伤的雁鸣/从一个故

乡/到另一个故乡/纷飞的翅膀上道路纷飞/而一颗心像一朵条动的火焰/风吹不灭/雨淋不熄/还有多少天空需要飞/还有多少草香 风吹不散/梦里梦外 一双翅膀总是牵挂着/牧草返青的地方/从一棵草到另一棵草/从一滴水到另一滴水/那一颗跳动的心/即使在梦里也不曾停下/一颗露珠的明亮(《一只大雁飞走了》)

诗人担任过大型音乐史诗的文学执笔，对于音乐有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感悟力。在他的诗作和散文中，音乐和节奏被充分地利用了它们各自的表现能力。音乐和诗歌本就是两种很重要的能体现心理上和精神上感受的文艺形式，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音乐曲调和伴有音乐的歌词就包含着精神情绪的相似物(按，也就是模仿品)”诗人明确这一点。而“美只对心灵才开放”，诗人先是以细腻的心思体会到世界的美好，然后又将这些美好的感受创作成带有节律的文字，并利用了不同的音乐能激起人们不同的情绪这一特性，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写物还是抒情，无论是长篇或是短制，无不铿锵顿挫，起伏有致，很富旋律之美。

阿古拉泰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在于朴实的文字和深厚的情怀中的历史感和哲理性。他用自己踏实地创作捍卫这种与生俱来的没有虚伪和夸饰的品格，用坚定的创作理念来反对那些不知所云的虚假艺术。他的作品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多具历史感和哲理性。就像《随风飘逝》里的诗作，正如同他自己所说：“是出自肺腑，发于心灵，有刺骨的疼痛，有汗水的咸涩、泪光的晶莹。”诗人把从现实中总结的对哲理的思考慢慢转化为对人类瞻前顾后的历史责任感，诗人看到的不仅仅是南飞的大雁、路边

的小花，更多的是劳动者的汗水和草原煤都的建设。“绿色的风 风雅地吹/吹走污染、陈腐和陋习/让‘煤黑子’换一身绿/让科学的肺叶/自由地呼吸……啊，年轻的树/你枝叶繁茂 绿色的理念深深扎根/矿山复垦 再造青山/今天的行动就是明天的煤/绿色的渴望绿色的梦/绿的未来将在你的绿荫下/幸福地乘凉”(《煤海上的草浪》之《年轻的树》)“老了，是在走不动了，让我/这双苍老的手再扎一座毡房吧/亲人们，不论那片痛苦的土地有多么远/也要让这片祥云飞越万水千山……住进毡房吧，什么样的震都不会倒/风从哪面吹过来，它都暖/莲花一样绽放的是明天美好的日子/细腻”“哈纳”是我理不清的心。”(《写在草叶上的感动——记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心灵的震撼》之《额吉的心》)

阿古拉泰，草原的孩子，用他生动细腻的情感和灵活敦厚的语言，让人们深切地领略到一颗为正义、为勇敢、为不朽的哲学、为人类的高贵品格而歌的心是如何在祖国绿色的草原的滋养下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支忠诚的笔是蘸了怎样的激情来书写他和他眼中的绚烂人生！

“虎面”与“酒脸”

——读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新作《酒脸》

□陈晓明

的层面上展开自己的文学叙事。其实仅就“酒脸”这个题目，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酒后吐真言，还是酒话不当真？真与不真间的吊诡，恰恰是叙事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酒脸”本身就带着一种新的小说理解，而这无疑表明蜀虎文学观念上的更新。

熟悉蜀虎的人知道，他以前的小说，带有不少侠义文学的痕迹，特别是《武陵的红》，人物来去自如，英明神武，革命故事与侠义传奇糅合在一起，让人联想到古典文学《水浒传》和《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这些革命历史传奇。这种叙述方式可能也和蜀虎的职业有关，日间“点兵沙场”，晚间的写作难免也倾向于快刀斩乱麻。不过，我们看到，在《酒脸》中，蜀虎却有意地避开了这种叙述方式。他不再依赖于那种传奇化的手法，而是找到了一个时空的基点，以“老四川酒店”为中心，叙述不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闪回。这部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处理都颇为自信，始终立足于川蜀大地，但又通过车阵的足迹身影，展现出那个时代的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遭遇和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一边是现在时的“老四川酒店”；另一边是回忆视点中的“布尔津收容所”，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叙述在两个时代穿行。这显示出蜀虎在小说叙事的结构方面的匠心。这种叙述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展示出过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也正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自身的历史记忆，是将往日的伤痛建造成一座“纪念碑”，铭刻那段屈辱和受害的历史，还是面对现实，从那些苦难的记忆中出走？小说的主人公“车阵”，在这里显示出了主人公不决的态度。他一方面不断的召唤出那

云南彝族作家普飞最早的短篇小说《我的舅母》和《红旗》，先后发表于1956年7月号的《边疆文艺》和1956年8月号的《红岩》上。不久他的另一篇小说《门板》就受到茅盾的赞扬。半个多世纪以来，普飞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重杠峨山街》《对象》《飘去的云》、小小说集《妇女队长》、儿童文学集《蓝宝石少女》《普飞儿童文学作品选》、幼儿文学读本《打豪猪》《猎村的孩子》《聆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的火把节》和长篇纪实文学《笔杆儿童话》等20多种，有些作品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80多种选本并译介到多个国家。他的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曾在省里和全国多次获奖。他的故乡峨山彝族自治县称普飞是峨山的一张“名片”，“国内外知名的彝族作家普飞，是峨山彝族人民的骄傲。”

普飞特别难能可贵、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有几点。第一，他1948年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武工队，建国初期因病复员回乡后就一直当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成为国家干部后仍坚持扎根农村、写农村、50多年如一日。他的身心和笔触没有一天离开过农村和农民。他是地道的真正的农民作家，是一辈子扎根农村、笔耕不辍、成果丰硕的彝族农民作家，是全国与他同时起步开始文学创作的农民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说：“我是一直生活在基层的，从来没当过专业作家，也没得到过创作假期，都是业余拼搏……这就促使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哼哧哼哧地在他人后面赶路；赶得上要赶，赶不上也要赶”。第二，他长期住在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却关注时代风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他在年过古稀之后，用背篓背回了电脑，用曾经持枪、挥锄的手，开始了自己的换笔生活。改革开放30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已摆脱了过去简单配合任务、图解“政治”的毛

病，特别是他的儿童文学和幼儿文学作品，以新的手法、新的语言，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个个生动有趣、充满幻想、令人着迷的童话世界，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第三，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和“市场需要”，这些年来我们有些作家逐渐背离了理性、道德、责任和良知，不再向往和敬重伟大、崇高与神圣，不再表现生活与人性中的真、善、美，而热衷于以其大胆的粗俗、亵朽的颓废和肆意的放纵，去宣扬腐朽、丑恶与肮脏，以助长社会上的道德混乱趋势和颓废堕落倾向。普飞“哼哧哼哧地在他人后面赶路”，认真学习

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新知识、好东西，努力与时俱进，但他有“为谁写的明白”、“为何写的清醒”和“如何写的自觉”，丝毫没有受到上述不良倾向的影响。他牢记一个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坚持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审美理想出发，努力创作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作品。

最近，我们读到了普飞的新著长篇小说《红腰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普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了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边疆彝族山村的一个爱情故事。小说第一章就把你紧紧抓住：七个美丽的彝族妇女正在山脚斜坡地的一片梯田里劳动，前方有一个陌生男人忽然沿着箐边的小路走下来。七个姐妹中最小最漂亮的林梅老远就从陌生男人穿的衣服裤子上(那是劳改农场统一发放的一种毛蓝布服装)认定“这男人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便第一个冲上去“双手死力抱住陌生男人”，其她几个女伴也跟着冲上去。地里找不到捆绑犯人的绳子，林梅只好带头把自己红腰带解下来，别的姐妹也学她解下红腰带，把逃犯死

□晓 雪(白族)